



# 中国境遇中青年研究的

## 现代性视角

□ 方 俊

**摘 要：**青年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批判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构成了现代性的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但是，作为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的现代性，本身也包含有内在的冲突和风险。中国的青年研究要正视现代性的话语，取舍其利弊，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青年研究；现代性；解放

某种意义上，人的发现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与此相同的是，青年期的发现和青年研究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这里的现代，指的是西方由启蒙运动所开启的有别于传统中世纪社会的历史时代。按照米歇尔·福柯的观点，作为现时代之开端的标志性事件是发生于19世纪初的认识型的“断裂”（discontinuities）。而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时代等同于理性化，正是由于理性对传统的持续祛魅，西方社会才走上了这条理性化的“合理的”道路。

在西方所特有的理性化道路上，主体的反思能力作为现代性的原则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社会学等学科对人的研究又受到意识形态化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s）理论的影响，因而人的发展也逐渐具备一种进化论的特征，在人类历史的未来，人将具备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完美形象。另一方面，已经相互分化的国家和市民社会又受到理性化的影响和指导，从而把社会各个领域纳入理性的社会秩序之中。随着

理性化的各种社会系统对经验世界的侵袭，前现代那种根据职业和地域性关联而确立的社会关系都消失不见了，抽象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规范的推广，以及“随着抽象体系的发展，对非个人化原则和陌生他者的信任，成了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sup>[1]</sup>。随着未成年人社会化模式和成年人个体化的社会化模式的形成和固化，青年研究从一开始就披上了现代性的外衣。

### 一、成长与解放：在现代性话语中的青年研究

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研究不同，由于注重共青团和思想政治教育在青年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的青年研究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由于青年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青年研究的目标是把青年培养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那个自由人的联



合体中，由于消灭了异化，人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劳动将成为人们生存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青年受到异化的生活关系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由技术控制的生活关系的影响，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青年的成长和人的完善自然成为无法实现的诺言。但是，中国缺乏西方那样的经济社会基础，“在中国的境遇中，现代性本质上‘不在场’或尚未生成”<sup>[2]</sup>。与此同时，受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指导的青年研究又必须遵循以青年为本、促进青年发展的基本宗旨，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因此，中国境遇中的青年研究又不能重复以前“两大阵营”对抗时期那种意识形态化的灌输理论。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发展生产，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必须培育全体民众的现代公民意识。因而，在中国境遇中的青年研究，必须把青年的成长与人的解放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对全体公民的启蒙与规训穿插其中。

在奥拉·斯塔芬森看来，沿着社会化历史这条主线，青年处在发展和资格之间。在中国，因为现代性处于不在场状态，而现代化又已经是国家确定的发展目标，青年研究不仅仅要关注青年的人格发展，帮助青年顺利实现社会化，成为能够承担责任，为家庭、社会乃至国家做出贡献的人；青年研究还需要关注青年人思想中的现代性成分，即如何用现代公民意识来培育青年人。这样，在青年期完成的人的启蒙在中国境遇中就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成年人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与此同时，按照现代性的标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维模式都是前现代的，因而是相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成熟意识的不成熟意识，启蒙又是对现代意识的培育和养成。因而，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境遇中的青年研究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

按照福柯的观点，在现代性语境中，自我意识的形成受话语秩序和权力秩序的影响。那么，人的解放这个问题就涉及在物化的日常生活实践系统中，自我关怀的自我意识如何才能与话语秩序和权力秩序保持距离。与此相应，因为具备着启蒙与规训这一现代性特征，青年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如何才能有助于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合理化这一历史总体性目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和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个体自由并未真正实现。因而，异化了的生活必须摆脱权力和金钱的支配，并为之保持恰当的距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社会合理化所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使得社会生活依然没有摆脱异化的命运。在金钱和权力的控制下，个体的自由并没有得以实现。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象征化的符号体系中，个体越来越深陷文化无意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主体与自由的关系再次被置于人们面前。为了实现理性的自我意识对主体的自我关怀，海德格尔把目光投向了对技术的追问和反思，并关注语言这一存在之寓所。而福柯则希望借助宗教使人们彻底改变自己的主体性存在，再度将从未停止运动的主体移植于那种实践和过程的历史领域之中。但由于语言、结构和无意识等范畴取得了优先性，它们都没有为日常生活实践留下余地。对于主体来说，其活生生的物质生命对物质和精神性的依赖，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问题。因而，人的解放要求再一次把理论和实践重新结合起来。

马克思对人实现其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所提出的方案是，将哲学的理性内涵融入获得解放的社会生活方式中。但要使人类获得解放，首先要使无产阶级摆脱金钱和权力的控制，通过工人革命使无产阶级夺取统治权，进而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全部生产工具置于无产阶级控制之中。一旦如此，被迫的劳动将变成自由自觉的劳动，公共权力也将失去其政治性质，变成公共管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3]</sup>。

然而，认识到劳动和主体理性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弭平了青年成长和人的解放之间存在的差异，因为这涉及日常生活实践系统的物化问题。由于被抛入世界的青年是在生活中操劳的日常此在，无法逃离现实经济政治的干扰，所以青年意识往往会成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由于社会知识和主体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阐释”(double hermennutic)关系，社会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脱域”和再嵌入的循环运作过程。青年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权力和金钱的压迫和诱惑就有可能被他们再嵌入社会之中。这样，当青年转为成年人以后他会把青年所遭遇的一切合法化，从而使异化的生活变得正当化。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日常生活实践在生活世界这一层面展开，实践哲学因此具有不同于劳动范畴的内容。与单纯的生产劳动不同的是，由于实践哲学必须指涉其他行动主体，所以它只能把理性安置在行为主体的目的合理性



当中。所以,当青年本身的利益被置于和其他群体一样的层面时,涉及青年实体的青年研究就不仅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还具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

因为社会主义还只是少数几个国家的现实,因为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所以,发展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现实领域的根本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人民摆脱了物质匮乏的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摆脱物化和异化。青年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不仅仅是青年成长与成熟,而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青年自身。只有当青年认识到社会力量是自身固有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让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青年的解放从而也是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所以,青年解放不仅仅是青年成长或者人的启蒙的同义词,因为解放涉及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所以青年解放一词就具有浓厚的价值理性色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青年研究虽然也关注青年成长与人的发展,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缘故,他们不可能把青年解放从而是人的解放当成其价值目标,人的解放与资本私有制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在中国境遇中,青年研究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后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所以,中国境遇中的青年研究不论其表现形态如何,采用何种研究范式,最后都指向人的解放这一理想诉求。

## 二、遗忘和逃避:社会规训的负面效应

由于中国的前现代性,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青年研究必须采用现代性的话语,将精神分析理论、人格发展理论、社会工作理论等引入到青年研究之中。在这一点上,过去存在于青年研究中的政治界限与学科界限,以及由共青团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已经逐渐被打破,前者存在的一个重要弊端就在于其研究范式过于重视阶级范畴的作用。比如,过去的青年研究中常常把“参与某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成员违反社会群体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活准则或价值观念的一切行为称为越轨行为”<sup>[4]</sup>。今天,越轨行为更指违反合理的社会规范的行为。过去由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的问题处理模式也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工作和精神分析等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这一转变,意味着教条化的阶级分析范式的式微,这一点与福柯的“治

理理性”有着相似之处。在福柯看来,由于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管理问题和治理问题,使得权力关系并非分析问题的唯一模式。

但是,当前的青年研究在关注青年成长的同时,似乎又忘记了关注青年解放这一远景目标。虽然青年研究一再强调要以青年为本,由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中发展较晚的领域,青年研究至今缺乏稳固的理论支撑。因此,青年研究成了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统计学等学科博弈的场所,这反映在近三十年来我国青年研究相关论文的主题中,“有关青年就业与职业、思想观念、教育与成才、失范行为、婚恋与家庭5个方面的研究最为集中,其比例达到全部研究的60%”<sup>[5]</sup>。在青年研究的对象中,在职青年尤其是农村在职青年很少受到关注,这种把青年研究主题放在在校青年身上的做法,尽管与研究者们大多是在校教师和学生有关,却也看出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漠视,存在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在校青年和在职青年之间的这种显著差异,意味着青年研究在内容和对象上的矫枉过正。青年研究中理论性的薄弱,从侧面反映研究者对意识形态的遗忘。

因而,当前的青年研究一方面把包括在校青年学生,甚至是青少年学生当作其主要关注对象,其成长问题因此被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与此同时,那些在职青年,尤其是农村在职青年则成了不折不扣的边缘人群,这一研究取向与当前中国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非常相似,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存在于社会中的城乡对立观念“无意识”地蔓延到青年研究之中的表现。因为当前农村在中国语境中处于前现代的位置,农村自然成了需要被改造的对象,农村青年也成了需要加以教育,才能适应现代文明生活的青年。主导着青年研究的这种拉康式的“大学话语”,将城市青年、在校青年学生置于更高的位置,仿佛他们的问题可以代表农村青年等边缘群体的问题,同样可以被当作是现代性的发展所导致的对前现代性的“遗忘”。与此同时,以传统模式为指导的青年研究中的各个主题,也丝毫没有触及社会的物化内容和实践问题。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境遇中的青年研究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样,同时受到“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者的影响。从研究主题上来看,青年社会化与其资格获取受到的关注比较多,对青年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关注和包容,也符合后现代所提倡的多元化的、有差异的联



合的平等关系的政治语境。但青年研究中理论和方法的不足，对研究对象的偏颇，本身表明了青年研究还处于一个不成熟的阶段，这一不成熟的学科如何承担起对青年群体的启蒙与规训，实现青年的成长和解放这些任务，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青年研究中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由于受到当前中国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物化的社会生活是当前所有人都无法摆脱的现实。同时，由于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和技术性在中国的普及，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青年的“遗忘”。

从理论上讲，因为异化了的生活涉及劳动范畴，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成为革命的对象。通过把生产工具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劳动成为人的类本质的组成部分。摆脱了异化的劳动将改变社会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合理的平等关系。然而，正是因为异化了的生活还涉及到社会实践范畴，所以合理化就不仅仅包含着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改造。与那种紧密联系着改造自然、创造物质的劳动范畴不同，社会实践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到精神和物质、金钱和权力等的相互关系，因此，仅仅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并不能完全改变异化的生活。

具体来说，在这个朝着现代化进步的社会中，社会越来越“合理化”，在科学技术和科层制的控制下，出现了保罗·利科所说的那种现象，“劳动显示出它在技术上的合理性和人性上的荒谬性”<sup>[6]</sup>。因为劳动仍然是青年获取社会中最重要金钱和权力所不得不做的事情，劳动并不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是青年成长和解放的最好手段。所以，如何才能把作为青年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的实践，与作为社会主导性思维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觉结合起来，就成了青年研究所应该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希望把青年通过共青团组织起来为着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实践在此突然变成了社会的伦理政治的核心。因此，中国语境中的青年也处在经济与政治的十字路口，由于受到讲求效率的市场经济的影响，青年不得不在经济理性行为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合理性经验之间受到精神上的煎熬。其结果是，一方面社会仍然在坚忍不拔地进行着理想主义教育，另一方面现实却以不公平的、物化的生活赤裸裸地暴露在青年面前。

处于社会网络之中的青年产生了对社会的无力感，由于社会现实和青年所接受的理想主义教育内容之间相差太大，社会弥漫着不正义，工作之余，越来越多的青年躲进私人生活领域，而这正是后现代的特质。就此而言，当前青年群体中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种后现代的思维模式。

在高扬人的社会属性的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原子化的个人生活无助于青年解放。就政治权力和资本导致了异化的生活而言，只有“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sup>[7]</sup>，才能实现生产关系的倒转，从而消除导致异化的阶级对立。各个孤立的个体组成联合体，实际上意味着陷入实践惰性中的个体的异化只有通过个体献身于群体的行为才能克服，因为只有自由自觉的群体行为才能反抗一整套的整合和操控机器，即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萨特看来，现代社会的这一整套操作机器是由正得势的技术统治设置的。现代社会借助于高科技力量，构建了一个形象和象征的资讯化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从时空上重塑了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生活在信息社会中的人们，越来越不习惯于传统的理性逻辑思维模式。表面看来，在信息社会中社会规范对人们的影响逐渐式微，人们在网络社会中可以自由活动。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和接收者，似乎所有人终于处于平等的地位。实际上，因为“技术的本质是由人的目的规定的”<sup>[8]</sup>，所以在信息社会中，虽然表面上的意识形态逐渐隐退，但社会对人的压迫却以新的维度呈现出来。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平等在现代社会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仅仅从政治上和法律上表明承认如下事实：社会已经征服了公共领域，区分和差异成了纯属私人的事”<sup>[9]</sup>。同样的，信息社会中人的信息交流的平等也表明了社会规范对信息社会的征服。

### 三、结语：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为指导

吉登斯断言，“现代性内在就是全球化的”<sup>[10]</sup>。当前，由于国内外思想交流的频繁与开放，国内思想界广泛受到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已经完成了从现代性启蒙到现代性批判的心路历程。但是，如果不能客观看待我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种现代性批判完全无助



于我们走出前现代的经验式文化模式。同样，青年研究如果不能正视这些因素对青年个体和群体的影响，研究者不能反思自己的研究范式中所包含的这些不合实际的价值观念，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因此，如果中国境遇中的青年研究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基础上，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范式，首先就必须正视青年研究本身的现代性意蕴。因为青年期是西方工业文明所人为制造并构建出来的产物，所以西方青年研究中对青年进行教育和社会化规训的形式肯定是我们必须参照的。换句话说，因为青年是有待教化的不成熟个体，所有社会规范又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意识形态成分，所以，青年研究作为整合功能，应该承担起为规训青年提供思想武器的责任；同时，青年研究作为社会制度合法化的论证手段，在中国境遇中也可以承担起为思想政治教育正名的重任。

由于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属于现代性的诺言，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缘故，现代性本身无法实现这一诺言。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自然也属于现代性的话语体系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克服社会领域的异化问题，是因为它把实践哲学和主体理性结合起来。而在中国境遇中，要避免包含在现代性中的那种风险和冲突，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远景目标，青年研究还需要把实践哲学与青年的成长成才和民族的复兴结合起来，同时兼顾到实现人的解放这一远景目标。

由于青年研究直接面对的是青年的社会实践生活层面，因此青年研究又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面。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由于包括青年在内的公民的现代性意识的启蒙尚未完成，盲目提出把青年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一目标还言之尚早。由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着眼于人的自由和平等，因此自然也包含着对传统父权论及可以视作其隐喻的社会监管机制的批判。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

义的青年研究要重构青年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虽然青年仅仅作为学童的观念已经得到纠正，但研究者们的研究对象却依然限制在以学童为主体的青年甚至青少年学生身上。因此，重构青年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还要重构青年研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在当前中国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研究者们必须重点关注农村在读青年学生和在职青年的观念变化，关注现代生产方式和思维模式对农村青年的影响。同时，人们又必须正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必须承认青年亚文化中所包含的各种前现代的、现代的以及后现代的因素。

如果以上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马克思的“现代性观”在价值上就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观”具有相同的内涵，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观也确实应当包含青年成长与青年解放即人的解放这两个维度。从而，青年研究对现代性本身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延续现代性本身的价值理性等精神性维度，抛弃服务于某一特定阶级的资本主义体系。因而，当青年研究把自己局限在习惯大声呼喊远大理想的思想教育中的时候，当青年研究抛开现代公民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去关注青年人格发展，仿佛现代性意识的启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过程的时候，当青年研究更习惯于关注在读青年学生的时候，中国境遇中的青年研究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带有强烈的现代性色彩。只是这样一来，青年研究要么远离了现代性的真实问题（关注青年成长成才、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么忽视了现代性的中国语境（中国总体上的前现代性特征）。因此，如何把对青年的现代性意识的启蒙，促进青年成长，以及为着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总体性目标这三者结合起来，中国境遇中的青年研究还有很长的要走。■

方俊：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方奕

#### 参考文献：

- [1] [10]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M]. Cambridge: Polity. p.120、177.
- [2] 衣俊卿. 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4).
- [3]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中央编译局, 1994. 295、294.
- [4] 洪守义. 青年行为学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209.
- [5] 风笑天. 三十年来我国青年研究的对象、主题与方法 [J]. 青年研究, 2012 (5).
- [6] [9] 高宣扬. 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下卷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5. 897、894.
- [8] 肖峰. 论技术的社会形成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6).